

## 《庄子》对汉赋的影响

金 松 姬\*

<目 次>

- |                  |                 |
|------------------|-----------------|
| I. 序 言           | 2. 《庄子》与西汉时期的汉赋 |
| II. 《庄子》与汉赋创作的影响 | 3. 《庄子》与东汉时期的汉赋 |
| 1. 《庄子》与汉赋体式的渊源  | III. 结 言        |

### I. 序 言

庄子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其所提出的某些问题与当代人面临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有一定的相同的特点,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对当代人也有参考价值,因此,我认为《庄子》思想、文学有其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研究。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学史上,两汉四百年是先秦至魏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儒学受到王权、君主的重视,经学亦随之盛极一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 正是在此一时期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文学,事实上也在广泛流传,发生着独特的影响。

在汉初,由于黄老学的盛行,人们往往把庄子学派的学说与黄老之学联系在一起。<sup>1)</sup>武帝时董仲舒创造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成为汉武帝“罢黜

\* 숙명여자대학교 강사

1) 司马谈作《论六家要旨》,说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所有各家都有缺点和错误,道家博大精深,自成

百家，独尊儒术”之“儒术”的核心。这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儒家概念，而是吸收了道、法、阴阳而成的新解释。到了西汉末年，在董仲舒学说的基础上蔓延讖纬神学。

儒学到了东汉和帝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的衰微，走上了衰落的道路。于是许多经学家为了探索人如何从世俗中解脱出来，便吸收《庄子》的某些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像马融、郑玄等人，只好认同老庄思想了，张衡、赵壹等文人开始借《庄子》思想表达离俗之情。

当我们读《庄子》的文章时，我们很难把其中思想的美和文学的美分开来，文章浑然一体，已达到文学家的极致。闻一多在《新月》第一卷第九期上发表《庄子》，主要是针对“有人要把说理文根本排出文学的范围之外”，他说：“要反驳那种谬论，最好拿《庄子》给他读”，“庄子是一位哲学家，然而侵入了文学的圣域”<sup>2)</sup> 他为这种观念展开出了以下理由：第一，“读《庄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那是文字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形与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只那一点，便是注定庄子在文学中的地位。……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到的机会确实也不多”。第二，“如果你要的是纯粹的文学，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尽够你欣赏的，采撷的。这可以证明如果庄子高兴做一个通常所谓的文学家，他不是不能”。庄子常用高超的文学技巧来表达他高超的意境，成为后世文章的指南。

体系，包含了各家思想的优点，从而深刻地概括了事物的本质，又随时发展，随俗施宜，最切于日用。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71-72页。

- 2) 庄子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见《天下篇》，该篇不一定是庄子作，但大体应是先秦的作品，他把所谓“六艺”的性质都区别开来了。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还没有我们今天所谓“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经济……”等分类概念，但是他们对包括这些在内的“文学”这个大概念下的各种典籍、著述，还是有自己的分类原则，并且对各个小类的性质、作用作了某种概括的。而他们所说的诗和乐，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和艺术。（参见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在汉代，儒学由受到王朝的重视，进而居于“独尊”的地位，经学亦随之盛极一时。随着儒家经典的日见推崇，儒家的诗学观和以“温柔敦厚”为特点的“诗教”也便深入人心。《诗大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儒教的政治教化之局限性在于经常忽略了个体的独特个性与情感的追求，也造成了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和损害。《庄子田子方》所谓：“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确实是儒家的局限性。在汉代，虽然儒学和经学盛行，但文人仍能自觉不自觉地突破这种正统观念的束缚，从历史遗产里吸收包括庄子在内的诸家思想之长。

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是指文学尤其是诗赋的创作，摆脱了儒家诗教和经义之学的束缚，而走上了独立发展的、具有创作主体个性的道路。由于有了庄子对文人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渗入和补充，汉代文人可以开拓自己的境界，丰富自己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文坛出现了抒发个人情怀的新倾向。文学创作风气之变，始于东汉末期。这一时期，文人吸收庄子的某些成分，写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个性特色，注重个人的感情、观点，强化自我的概念。庄子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代，尤其是东汉中后期的传统文学、文学理论与实践，并为其提供文学精神，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 II. 《庄子》与汉赋创作的影响

### 1. 《庄子》与汉赋体式的渊源

王国维说过：“凡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考·序》）<sup>3)</sup>汉赋是汉代文学的正宗。<sup>4)</sup>一般认为，汉赋作为文学体式

3)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学自觉时代是从魏晋(含汉末建安时期)开始的。这

的直接渊头是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和荀子的《赋篇》。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芳之赋“狐裘”，结言豆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生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爱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

再看《诠赋》篇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刘勰认为赋体的形式和《诗经》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风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他在形式上、内容上、功用上都把赋与诗混在一起。从这段序里可以看出，汉赋的歌颂和讽谏，是从《诗经》的《雅》和《颂》中学来的。从这里可以知道，赋体在形式过程中受到《诗》楚辞的影响。

汉赋华丽的辞采，承袭了楚辞的传统，《文心雕龙·辨骚篇》称楚辞“自铸伟辞”，“惊采绝艳”；《诠赋篇》称赋体“词必巧丽”，“蔚似雕画”。如《汉书·艺文志》作者就说，司马相如、扬雄等，“竞为侈丽闳衍之辞，没其风谕之义”。刘勰在《夸饰篇》中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鸕鷀俱获。”情况却是如此，刘勰批评汉赋的“虚辞滥说”，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谓之“假象过大”、“逸辞过壮”。

---

种说法最早由鲁迅先生提出，见于他的《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章原是1927年7月在广州的一次演讲的记录，“文学的自觉时代”用了引号。（李文初：《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6页）我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应该从魏晋上推到汉代的汉赋。真正在形式上独立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专论极为罕见，但是可以说东汉末的文学创造和文学理论批评，早已进入独立、自觉发展的开端、阶段。

4) 蔡守湘主编：《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史》，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在屈原、宋玉创作的影响下以及汉帝国的强盛因素的推动下,汉代的辞赋臻于鼎盛。班固在《两都赋·序》里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孙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故孝成之世,论而象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雷郁律于岩兮。”<sup>5)</sup>

钟嵘在《诗品·总论》说:“自王(褒)、扬(雄)、枚(乘)、马(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指写诗)靡闻。从李都尉(陵)迄班婕妤(姬),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失(丧)。”两汉的文坛确为汉赋文体正式成立。从这里可以看到王国维的观点并没有错。

汉赋继承先秦诸子散文和纵横家说辞的繁辞,极为铺陈,在这些过程中,它还是受到《庄子》散文的影响。刘勰认为其“玮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sup>6)</sup>。清人章学诚也指出:“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sup>7)</sup>他又说:“……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京都诸赋,苏秦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夫》、《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sup>8)</sup>

5) 班固这段话,讲了赋的属性,诗赋的兴衰与时代的关系,诗赋的作用;但着重讲了汉赋的创作在汉代的盛况。西汉初期,由于社会不安定,经济也有待恢复与发展,人们尚无暇顾及艺文。到了武帝时,“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史记·平准书》)由于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强盛,汉赋的创作才因时趁势而迅速发展起来。(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6) 《文心雕龙·时序》。

7) 《章氏遗书·校雠通义》卷三。

8) 《文史通义·诗教上》。

文学创作风气之变，始于东汉末期。东汉末，赋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大的变革期。赋出现“诗化”的趋势，而诗也产生“赋化”的迹象。在赋的“诗化”过程中，作品抒情加强。在这一节对汉赋之手法、表现方式、结构、内容、特征、意义来考察，理解《庄子》在对汉赋的影响。

## 2. 《庄子》与西汉时期的汉赋

首先值得我们讨论的是贾谊。贾谊是西汉初期进步的政治家、政论家，也是杰出的骚赋文人。《吊屈原赋》表面上是揭露屈原生活时代社会的黑暗，为屈原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实际上则在抒发个人的情怀，倾吐个人的愤懑不平。贾谊的时代是大统一的时代，他面临的矛盾是自己不被信任，其背景是黄老思想同儒家思想的冲突；屈原的时代是一个诸侯纷争的时代，他面临的矛盾是国政的危机，屈原、贾谊二人面临的矛盾不相同。这时贾谊受《庄子》思想很深，所以他无法历九州，就想走“固自引而远去”<sup>9)</sup>的道路，从封建政治的角度消解重压，在精神上保持人格的独立。他通过鲜明的比喻和对比对屈原面临的黑暗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而且他深切地表达自己所处形势的压抑。<sup>10)</sup>《庄子·天下》篇中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都是用“得意忘言”的方法，去象征“道”的语言。《庄子》的比喻是其哲理就在比喻之中，几乎可以说“寓言”代哲理。《庄子》的寓言或比喻一般是神话或者物语，大部分的内容并不是人类社会所有。贾谊又作《鵬鸟赋》。这篇作品是贾谊谪居长沙三年之后见鵬鸟

9) 《吊屈原赋》中说：“般纷纷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鸾凤伏窜兮，鸱鸢翱翔。闾茸尊显兮，谄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屨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10) 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摇增翻逝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鱣鲸兮，固将制于蚁蝼。

入居舍而写的。他以道家特别是庄子的思想为基调，表达了天地万物变化无穷，福祸、忧喜、吉凶紧密联系的思想：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城。

然后肯定了庄子的理想人物及其超越的人生观，否定了世俗之人对名利的欲望：

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东西。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庄子·养生主》强调“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所说的处世，就是养生之道，既不求富贵名誉，也不致走上罪恶刑罚的道路，“依乎天理”。《人间世》是针对社会现实谈人生哲学。它说：“方今之时，仅免于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又说：“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庄子认为，在乱世，靠一个人的想法要改变社会是不容易的，因此，只能是顺世。

所谓“纵躯委命”、“知命不忧”，置生死于度外，庄子的至人境界也不过是临时寻觅的精神的解脱而已，实际上他的心灵创伤还没消释。《鵬鸟赋》假托自己与鵬鸟对话的形式，有意识的虚构问答，借鵬鸟之口宣扬庄子思想。

汉赋由骚赋发展到大赋，中间经过了散赋这个过渡阶段，代表作家是枚乘。枚乘代表作是《七发》。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说：“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

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詮賦》说枚乘是“辞赋之英杰”。枚乘假托客主问答、韵散兼用、铺陈夸张、辞藻华丽、体制宏伟等文体特征于《七发》<sup>11)</sup>表现出来。比喻丰富新颖，形象生动传神，读之使人感到奇观。

汉武帝时代，是汉代的经济繁荣、政治安宁的时期，同时也是汉赋创作的繁荣时期。武帝非常好赋，他“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文，号令文章，焕焉可述”<sup>12)</sup>，作为帝王，其文化建树亦可谓空前。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说：“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覆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sup>13)</sup>

《子虚赋》作于相如游梁之时，汉武帝读此篇而思作者，相如被召，又作“天子游猎之赋”，就是《上林赋》。赋由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个人的对话所组成，假设问答经常见于《庄子》的寓言。《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的故事，设文惠君与庖丁的问对；《齐物论》“罔两问景”的故事，设罔两与景的问对。《子虚赋》描述梗概是：先让子虚夸耀楚的云梦泽广大丰饶，楚王田猎的声势场面，乌有先生既不满，他批评子虚对楚国的夸耀乃“章君之恶而伤私义”。接下来相如在《上林赋》中提出的“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的问题。《子虚》、《上林》的内容是讽颂并存的，既表现了大一统帝国之气势和声威的思想倾向，又含有讽谏统治者不可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的深意。这时他用虚构夸张表达了他的意思。《庄子》

11) 其始起也，洪淋琳焉，若白鹭之下翔；……，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侯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决胜乃罢。

12) 《汉书·武帝记》，武帝继位之初，就用安车蒲轮征召乘，惜乘年迈，卒于道中；读到司马相如《子虚赋》，他更大为赞叹，遂即召之。

13) 锦绣纂组，害女红(工)者也。(《汉书·景帝记》)《淮南子·齐俗训》也有同样的论调。扬雄后期也以为：“雾縠之组丽，女工之蠹也。”又，孔子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汉赋的丽靡之辞更为人们所不齿。

散文,常常大量吸收神话传说材料,或者虚构杜撰人物,利用夸张、渲染,表现了文章的思维、情调、手法充满的浪漫主义色彩。《子虚》、《上林》也是受到《庄子》这种手法的影响。

从司马相如的创作实践来看,他的确实践了自己的观点。据《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相如曰:‘……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包括宇宙”,就是要以广大、博大为美,用一种尽收万物入眼底的态度。“秋田青丘,彷徨乎海外”引用《庄子·逍遥游》的“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语义,表达了到世俗世外去寻觅精神上寄托。如所谓“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就是清除杂念,排除外界的一切干扰,这是与《庄子》所说的“虚静”相通的。

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皆为典型的贤人失志之赋。抨击黑暗的世道,抒写生不逢时的感慨及郁愤不平的情怀。在具体选择人生道路上,司马迁强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这个思想,与贾谊在《鵬鸟赋》中表达的思想相同,都是以庄子思想为渊源的。《庄子·刻意》说:“圣人……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返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大宗师》说:“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古之真人,不计生死,随物而变,应时而行,要超越生死界线。

扬雄(字子云)<sup>14)</sup>,西汉末思想家和辞赋专家。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称,扬雄有赋十二篇。《汉书·扬雄传》说:“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以为式。”又说“辞莫丽乎

14) 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主编:《两汉大文学史》,1998年,第184页;扬雄一生著作丰富,哲学和一般思想著作有仿《易》而作的《太玄》,仿《论语》而作的《法言》。其赋则今传有《羽猎赋》、《甘泉赋》、《长扬赋》、《反离骚》、《解嘲》、《酒赋》、《太玄赋》、《逐贫赋》、《蜀都赋》以及《文选》注所征引的《核灵赋》的残文。这些都见于《全汉文》。

相如，作四賦，甚斟酌其本，相与仿依而驰骋云。”由此可见，扬雄模仿相如，一方面限制了它的创造性和个性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因为有竞赛的意思，所以模仿之中也多有突破。清人程廷说：“子云之《长扬》、《羽猎》，家法乎《上林》，而有迅发之气。”《羽猎》、《甘泉》、《河东》、《长扬》是扬雄仿依相如而作的四赋。他能做到效法前人而不为前人所囿，显示出自己的新意、自己的独特风格。稍晚于扬雄的桓谭在《新论》中记载，扬雄自为作赋苦心：“思精苦，《甘泉》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sup>15)</sup> 可以看见其写作时为了有创新，尽力之至。扬雄利用“推而隆之”的手法，对汉武帝的淫奢进行暴露和批评是到处可见的。这种手法的特征，实际上也就是说反话，貌似赞扬。对甘泉宫的描写就是其中一例：“洪台崛其独出兮，概北极之嶙嶙。列宿乃施于上荣兮，日月才经于栊楹。……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长途而下颠。”

扬雄慨叹的语气，批判的意味更深厚了。《汉书》本传，说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贤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扬雄的生活贫困，对人民的疾苦容易理解，他的赋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提问题的。庄子也虽然生活贫困，但却甘心情愿地过着贫困的生活，终生不仕，轻视功名，一生“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超俗”。<sup>16)</sup>

《甘泉赋》在描绘神怪与物象时，从整体上构成了较为含蓄蕴藉的境界。“配帝君之县圃兮，象泰一之威神”，<sup>17)</sup>这段对甘泉宫的描写，驰骋奇异

15) 《全后汉书文》卷十四，较之司马相如之《上林赋》，《甘泉赋》的讽喻之意更为明确。《汉书·扬雄传》云：“（甘泉宫）且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遇谏则非时，遇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所为，觉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卿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厘三神。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微戒斋肃之事。赋成奏之，天子异焉。”

16) 杨伯峻，《孟子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

17) 于是大厦云谲波诡，摧摧而成观。仰矫首以高视兮，日冥眴而亡见。正浏濫以弘倘兮，指东西之漫漫。徒徘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乱。据轸轩而周流兮，忽坱圠而亡垠。翠玉树之青葱兮，璧马犀之磷磷。金人伉伉其承钟虞兮，嵌岩岩

想象的夸张，也就显示出此赋的浪漫主义特色。许多文学史研究者都把庄子、屈原并列作为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楚辞》侧重于强调人工修饰之美，《庄子》所向往的是绝无人工痕迹的天工自然之美。扬雄的《甘泉赋》还是受《楚辞》之修饰的影响，扬雄四赋与司马相如多“虚辞滥说”不相通，因此，《文心雕龙·体性》批评辞人之夸饰，却认为“子云沈寂，故子隐而味深”，《文心雕龙·才略》说“子云属意，辞人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扬雄的四赋虽然继承了自司马相如以来的美丽辞采，但是比司马相如有更多的现实观念，同时，也受到了庄子出世思想的影响。

扬雄的述志抒情赋是写于后期的《解嘲》与《逐贫赋》。这个时期是一个皇帝昏庸，外戚、佞幸及趋附者飞黄腾达的时代，扬雄坚持安贫乐道的节操，以著述为业。他在《解嘲》指出，战国时诸侯纷争，“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此所谓“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这是表现一个士人备受漠视的荒谬的时代，扬雄说“自守者身全”，明确表示以庄子精神为依归的意向：“知玄知默，受道之极；爱清爱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逐贫赋》、《解嘲》、《太玄》大量注入哲理成分，是受到贾谊《鹏鸟赋》的影响。《逐贫赋》哲理、抒情、描写兼备，且能融合为一，同时，以哲理与文学的结合达成与《庄子》精神的契合，将“贫”拟人化，假“扬子”与“贫”的对话而展开描述：“扬子遁居，离俗独处……终贫且窶……惆怅失志，呼贫与语。”于谐谑游戏笔墨中见悲痛愤激之情；结果“贫遂不去，与我游息”。可以说是他坚持操守之信念的流露。这些构思新颖，语言通俗，风格诙谐，不像此前扬雄赋的特征。《庄子》多寓哲理于寓言故事中，用讽刺幽默的笔调表达了语言的谐趣。或暴露社会现实生活的虚伪。如《庄子·列御寇》把曹商对富贵的钻营视为舐痔之术，都包含辛辣的讽刺。扬雄受庄子这种表现的影响，表达了他的作品思想的深度。因此，《解难》、《太玄赋》作品说是高深的义

其龙鳞。扬光曜之燎烛兮，垂景炎之斡斡。配帝居之县圃兮，象太壹之威神。

理。西汉文人的压力的表达，只是反抗当时社会局势的一种尝试，但西汉末扬雄开始突破儒教政制教化的局限，试图实现精神的超越。

### 3. 《庄子》与东汉时期的汉赋

东汉前期的赋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模仿着西汉，但客观的政治形势毕竟有所不同了，赋的题材主题不知不觉地改变。冯衍是东汉前期的赋家。冯衍赋完全存于今者仅《显志赋》一篇，作于光武帝建武末。从《后汉书》本传载其生平事迹看，冯衍的用世之心强烈，建武末其志不遇，无奈之下，庄子思想成了他的精神支柱：“陂山谷而闲处兮，守寂寞而存神。夫庄周之钓鱼兮，辞卿相之显位于陵子之灌园兮，似至人之仿佛。盖隐约而得道兮，羌穷悟而入术。离尘垢之窈冥兮，配乔松之妙节。惟吾志之所庶兮，固与俗其不同。”由此可见，东汉前期虽被称为儒家经学的极盛时代，但老庄思想在文人的心目中具有存在。末段以隐居自期，他所表现出的内容是超脱，但实际上并没能够忘怀世务的矛盾感情。

东汉末，张衡的思想内容仍多为受儒学的影响，但由于大一统政权的崩坏、社会的动荡，他的个性倾向于老庄。《东京赋》的为无为，事无事，《思玄赋》、《归田赋》的人生无常，《鬻髅赋》的逍遥、窥破生死，《灵宪》对“道”的描述，宇宙的“无极无穷”，都是继承庄子思想的表现。张衡正式接受庄子思维方式的启发、暗示而作出的创造性发展。他已开始突破“诗教”束缚的趋向，作品抒情性加强，他的转变，确能启迪魏晋人的文学创作实践中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

两汉所有赋家在谶纬神学思想的笼罩下，当时创作大赋经常造成了荒诞、虚妄的夸张，想象的手法，张衡赋的想象富有科学的精神。张衡《灵宪》就说，宇宙是无限的“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对宇宙的无限的想象力表达在庄子的眼目中是一个合乎科学精神的说法。东汉是谶纬神学的极盛时期。许多的两汉文人在批评神学迷信思想过程中，排斥夸饰，这是受史学传统影响的结果。刘勰在《文心雕龙·夸饰》一篇，他认为：“文辞所

被，夸饰恒存”，关键是要使用时注意“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他还在《夸饰》篇中详细评论了赋中夸饰手法运用的得失：

张衡《羽猎》，因玄冥于朔野。变彼洛神，即非罔两；惟此水师，亦非魑魅，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辞入炜烨，春藻不能成其艳；言在萎绝，寒俗未足成其调。

张衡赋通过赋的诗化、骈偶化的迹象则重于强调人工修饰之美，但是晚年所作的《归田赋》无论内容或形式都体现了与汉代赋铺张夸饰不同的特点，给人以清纯质朴之感。张衡创作这篇文章心态，受到《庄子》思想很大的影响，庄子提出了“即雕即琢，复归于朴”（《山木》）的思想。他认为“形残而神全”，不必注意外在的修饰的，张衡很好的把握了这一点。

《归田赋》是短小明快的写景抒情赋。它受《庄子·刻意》“吾入山林欣欣然而乐矣”之思想的影响，生动地流露出作者对归田生活的向往。“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知”。这正是作者理想中的生活环境，与当时官场的黑暗、现实生活的压抑构成强烈的反差。张衡反世俗价值观念而行，封建时代是一个崇尚官本位的时代，文人都想到官场上实现理想，但是却看不到希望，“徒临川以羨鱼，俟河清末期”（《归田赋》）方法之一就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庄子·让王篇》），不得不到世俗之外的大自然中去寻求精神上的解脱。

张衡在“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sup>18)</sup>一段写景文字中表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且直言自己徘徊此境的欢快感，在主客观的交融中自觉的产生了自然审美意识。因此可以说已经包含着魏晋玄学的萌芽，特别可以说它首开田园隐逸文学的先河，但实际上，赋中“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陈三皇之轨模”的意思是仰慕圣贤之道，跟庄子思想不同。

18) 《归田赋》：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鸕鶿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嚶嚶。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张衡开始突破儒教的政治教化之限界性，吸收庄子的某些成分，但还不能够达到庄子本身的大而无当的空想。社会文化格局和士阶层的价值模式是非常强大，文人不容易摆脱与道德、政治之间的拘束。

张衡的《二京赋》、《思玄赋》作品，都是作家有感而发、有目的而为之。《二京赋》，本来就是针对当时统治阶级的“逾侈”现象而写的。对上层社会乃至最高统治者的荒唐现象，例如汉武帝的求仙食王，想长生不老等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关于《思玄赋》，《后汉书·张衡传》云：“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对人生的危机感较高，内心也充满了忧患意识，《庄子》中这种心理表现出得更为突出，《人世间》所载接輿歌“福轻于羽，莫之知载；祸重于地，莫之知避”。

张衡借助于“比”的象征，无论是叙事咏物，还是抒情说理，都是力求直指社会与个人的矛盾，《东京赋》有云：“今公子苟好剽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殍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

《文心雕龙·比兴篇》对两汉赋作中的比喻使用情况用了分析。

夫此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此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莫不纤综此义，以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

张衡之赋的实践也证明：歌颂与暴露，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美”与“刺”，都是同样存在的，不能够突破了传统美学注重“美刺”等政治范围内。庄子的人生理念赋予张衡以超脱的生死观，实现对痛苦的消解和精神上的超越。对于不能曹时，庄子的态度是“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庄子·至乐》篇云：“庄子妻死掉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的乐观主义的思考。

在《鬻髅赋》中，张衡受《庄子·至乐》篇庄子遇鬻髅寓言的影响，描

述了张平子(自己)与髡髻(庄子)的对话：“张平子将游目于野……髡髻曰：“死为修息，生为役劳”、“以日月为灯烛，以云汉为川池，以星宿为珠玉。合体自然，无情无欲。澄之不清，浑之不浊。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髡髻赋》，对死亡发出了赞叹，表现了悲观厌世思想，用嘲弄的笔体来吐露心中的不满，同时具有自我愉悦的效果。这是展现出一种与两汉经学家不相同的新的风貌。

《二京赋》中的赞美也可以看到乐观精神的表现。张衡认为参观也是一种快乐，“此乃游观之好”，《思玄赋》描写如一个灿烂的、充满光明的世界。张衡偏重了欲摆脱浊世、寻觅理想处所的情景；但幻想经常造成落于现实之中，扎进经籍文典中寻求寄托，表示要效法先贤，“行偏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默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消摇”。（《思玄赋》）张衡所说的精神显然依靠儒家的理想，不是依赖为了解放人性，争取自由。

庄子热情的探寻自然的一切，要求圣人“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知北游》）。人生在世，就像倒悬一样的痛苦，要从世俗的快感超越达到“自适”。

张衡的乐观性依赖儒家的乐观性，不能够突破依赖自己的能力而感到快乐。因此，如果意识到宇宙的庞大，他同时就会感到自己的微小。空间的无限性会带来悲哀感。《大宗师》描写“道”之大：“在大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指出它的“大”主要表现在无限的时空。张衡所表现出的文章，接受庄子思想，但还是受儒家思想支配，即具有对人类不可解除的负担。但是张衡赋受庄子思想的影响，进入一个大的变革期。由于赋出现“诗化”的趋势，张衡赋在写作过程中可以明显的看出个性特色，注重个人的感情，强化自我的概念。他在审美情趣上，还是喜好华丽雕饰，但是将两汉时期流行的浮薄之美加以改进。他受庄子强调“自适”思想的影响，开始尝试忽略赋中的感情因素，逐渐显现出自然的一切——自然之美和万物之理。

东汉自桓帝已面临着各种矛盾的局面，民变不断发生；到汉灵帝中平年间，终于发生了黄巾农民大起义。而且由于皇帝的支持，宦官在统治阶

层内部斗争中往往取得胜利，所谓“党锢之祸”就是宦官得胜的一个突出的标志。这一时期赋的代表文人是赵壹、蔡邕等人。两人赋中引人注目的是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愤慨，基本采用了借古讽今的方式来表现。在蔡邕的《述行赋》“穷变巧于台榭”等四句，运用了鲜明的对比，且为了加强批判力度，抒发内心郁愤，加强了讽刺性和感染力。《刺世疾邪赋》是赵壹的代表作，鲜明地提示了他对黑暗世道的批判态度。同时，表达了正义的信念：“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这些愤世嫉俗的士人，突破汉大赋的传统，创作了一些批判现实的抒情小赋。在《庄子》的寓言里所表现出的感情更为激烈，如《列御寇》把曹商对富贵的钻营视为舐痔之术；《外物》揭露儒家的虚伪性，把诗礼作为盗墓窃珠的依据，都具有庄子辛辣的讽刺、批判，对赵壹的赋作有一定的影响。

### III. 结语：《庄子》在对汉赋传统的奠定中所起的作用

在汉初，由于黄老学的盛行，人们往往把庄子学说与黄老之学联系在一起。从《淮南子》内容来看，基本上表现为对老庄有关思想材料的引用和阐释。武帝时，董仲舒创造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成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儒术”的核心。他强调天道主宰人世，操纵政治，这时，儒家的诗学观更加深入人心。西汉文人在没有“选择的自由”的情况下，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因此，从西汉末年起，尽管儒学和经学盛行，但文人还是积极的尝试突破这种正统观念的束缚，向往和追求人格独立的精神。这时他们就吸收庄子中的某些思想成分，探索人如何从世俗中解脱出来。东汉中期，一大批文人受庄子思维方式的启发，已开始突破“诗教”束缚的趋向，作品抒情性加强，确能启迪魏晋人的文学创作实践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东汉末文人更注重自我意识，更注重抒写个性。他们深刻地感受到生死观念，于是这种意识与庄子所表现出的意识日渐相同。

所谓“文学的自觉”，是指文学尤其是诗赋的创作。由于有了庄子对文人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深入，汉代文人可以开拓自己的境界，丰富自己的想象。从西汉的武帝时期起，时代经历了盛世-衰世-乱世的转变。文学创作风气之新倾向，始于东汉末期。这时，庄子所说的生命意识在汉代文人赋创作有非常大的影响。东汉末汉赋运用了鲜明的比喻，抒发了内心的郁愤，加强了讽刺性和感染力。这种情绪不是由个别事件的触发而起，而是一个时代的抒情基调，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人类对生死存亡问题的关注。东汉末社会上的文人的觉醒，可以说反映出那个时代哲学美学的真正深度。

#### 〈参考文献〉

-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  
汉·杨雄，宋·司马光集注，《太玄集注》，中华书局，1998年  
刘勰，詹鍈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李刚，《汉代道家哲学》，巴蜀书社，1995年  
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孙以昭、常森，《庄子散论》，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  
李生龙，《道家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兵麓书社，1996年  
赵明、杨树增、曲得来主编，《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  
褚斌杰、谭家健主编，《先秦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蔡守湘，《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史》，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115-124页  
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汉代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  
杨树增、陈桐生、王传飞，《盛世悲音；汉代文人的生命感叹》，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陈德礼，《人生境界与生命美学——中国古代审美心理理论纲》，长春出版

社, 1998年

金学主, 《汉代的文人和诗》, (韩)新雅社, 2003年

(奥地利)雷立板, 《张衡, 科学与宗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

费振刚、胡双宝辑校, 《全汉赋》,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陈庆元, 《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张启成主编, 《汉赋今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年

曹明纲, 《赋学概论》, 古籍出版社, 1998年

马积高, 《赋史》, 古籍出版社, 1997年

张清钟, 《汉赋研究》, 台湾商务印刷馆, 1975年

万光治, 《汉赋通论》, 巴蜀书社, 1989年

刘斯翰, 《汉赋: 唯美文学之潮》, 广州文化出版社, 1989年

蒋文燕, 《汉赋类别流变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2002年

### <국문제요>

《莊子》철학은 生命哲學이라고 말할 수 있다. 중국고대의 사상이나 문학사에 있어서, 兩漢시대의 특징은 儒學이 왕권과 군주로부터 중시 받고 경학 또한 극성을 이룬다. 따라서 儒家의 詩學觀과 “溫柔敦厚”를 특징으로 삼는 “詩教”역시 사람들의 마음에 깊이 스며들어 있었다. 유교적 영향으로 政治的 教化에 주력하는 漢賦의 한계성은 각 개인의 독특한 개성과 정감을 드러내는 문학적 효과를 나타내지 못했다. 한대에 비록 儒學과 經學이 성행하긴 하였으나, 문인들은 이러한 정통관념의 속박에서 벗어나 고자하는 노력을 기울이고자 한다. 이때 老·莊을 대표로 하는 道家學說, 특히 莊子의 장점을 받아들여 문학의 영역에 적지 않게 수용함과 동시에 독특한 영향을 일으켰다.

儒家 정통사상을 깊이 받아들인 일부문인들은 차츰 “文에 대한 自覺”을 하게 됨에 따라, 莊子의 사상을 받아들이게 되었다. 이로 말미암아 문

인들은 사고력의 영역을 넓혀나가고, 자신들의 상상력을 풍부하게 키워나갔다. 특히 賦 創作의 風氣가 변화하는 것은, 東漢末期에 비롯되는데, 이 시기에 문인들은 莊子의 사상을 받아들여 개인의 감정·관점·자아의 개념을 강화시켜나갔다고 할 수 있겠다.

주제어: 《莊子》, 漢賦, 유교적 속박 개성

